



中国共产党 百年革命话语的建构与拓新

罗永宽 蓝天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历经百年的不懈奋斗史中,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革命”的话语理论与行动模式,构筑起系统的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构建生成“阶级革命”为核心的话语体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延伸拓展以“不断革命”为核心的话语体系,改革开放以来至新时代重释升华以“社会革命”为核心的话语体系,进而在新时代形成了“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并重的双核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在理论性与实践性双向互动的动态统一过程中,科学把握影响革命话语历史嬗进的关键要素与基本问题,继承发展百年革命话语守正创新的价值经验,实现了革命话语主体的自我超越与境界跃升,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建构与拓新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1.03.002

收稿日期:2020-07-06

作者简介:罗永宽,男,湖北十堰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 w31313@126.com;

蓝天,男,江西赣州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是一部不懈推进革命实践的奋斗史,也是一部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史,一部不断接力探索革命、建设和改革规律的理论创新史。中国共产党依革命而诞生,为革命而奋斗,靠革命而执政。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进行整体性的分析和认知,离不开不同历史条件形成的具体语境。革命话语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话语解释体系,是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系统表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巩固执政地位的话语根基,也发展嬗进成为指引中国共产党进行新的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的意识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发展史上极具典范意义的话语创新和理论创造。

“革命”一词最初来源于拉丁文词根,本意为“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17—18世纪,“革命”概念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形成变动政治秩序的现代语义。中国古代也有“汤武革命”,理解为“变革天命”,意指“改朝换代”。西方“革命”概念在近代中西对接、古今转换的过程中渐成中国化“革命”涵义。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概括道:“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和平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①“中国革命”的概念开始拥有现代性涵义,代表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秩序自下而上的根本变革。

马克思认为:“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就这一点来说,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就这

^①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1904),《梁启超全集》第3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8页。

一点来说,它是政治。”^①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各个阶段,时代环境赋予“革命”概念不同的内涵与意蕴,革命话语因而呈现出不同形态的话语特质。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话语的历史嬗变,彰显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革命话语理论的自主探索与守正创新。依据中国革命的历史条件、主体力量、直接对象、目标任务等变化,我们可将这一过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消灭敌对阶级的革命过程,形成以“阶级革命”为理论内核的革命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各革命阶级作为革命主体,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第二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以“不断革命”为理论内核的革命话语体系,在革命话语主导下以社会改造、经济建设、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推动国家建设;第三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改革开放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成以“社会革命”为理论内核的革命话语体系,革命话语主要作用于破除阻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思想和体制障碍,在探索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四个阶段即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为了适应广义的社会革命发展的新境遇新要求,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国人民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同时,强调“自我革命”话语,形成“两个革命”同向同行、同频共振的双核话语体系。

一 阶级革命: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历史生成与理论建构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建立,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参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过程中,构建起“革命与反革命”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中国共产党以此革命话语理论领导近代中国的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一)“阶级革命”话语在因应“国民革命”话语中生成

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一,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阶级斗争体现在党的革命纲领中,尚未转化为指导工人运动的“阶级革命”话语。《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了党的名称、性质、任务、纲领、组织和纪律,规定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发动工人阶级进行反对军阀官僚的斗争,具有阶级斗争的思想内涵。面对组织工人运动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革命话语倘若缺失,则无疑会增加组织工人阶级的难度。

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后,国民党擎起“国民革命”的话语旗帜,主张“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宣称国民中各阶级利益的一致性。随着大革命的节节推进,“国民革命”话语传布更广,已成为国民党革命行为和执政合法性的话语凭借。在“国民革命”强势话语主导的革命情势下,真诚参与国共合作、积极投身国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阶级革命”话语在传播力和影响力上有所趋弱。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革命话语不仅是增强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力和思想引领力的行动指南,也是增强革命吸引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的动员策略,更是增强政治对抗力和革命战斗力的重要手段。由于当时国共两党在组织基础、政治影响及整体实力上的差距,中国共产党要立即从国民党手里夺取“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的革命话语权是相对困难的。因此,要基于对近代中国阶级社会之国情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结合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以及苏联的革命经验,以阶级斗争理论阐释清楚中国革命,明确革命的性质、对象、主体、领导力量、目标和道路等基本问题,才是革命所需的第一要义。瞿秋白、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在大革命失败前后分别进行过思考和探索,陆续发表了论述中国革命和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力量的文章。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其中的杰出篇章,他在文中强调:“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②他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地主与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些状况构成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为“阶级革命”话语的构建提供了阶级划分依据,也为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分清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1925年初召开的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思想,同时强调了中国革命的特性在

^①卡·马克思《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1844年7月31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395页。

^②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页。

于阶级斗争和阶级性。在《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中提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指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如此无产阶级在参加民族运动中，方不致失其特性——阶级性与世界性。”^①在这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将无产阶级的阶级特性与民族革命结合在一起，以“阶级革命”话语替代“国民革命”话语的努力方向。中国共产党明确强调：“孤独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已经不是适宜于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了……民族争斗的力量之发展，恒依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阶级争斗的力量之发展为正比例。”^②至此，“阶级革命”话语的核心要义基本确立，然而此时“阶级革命”话语尚未与劳动群体搭建广泛的联系，革命话语的塑造与取得实效还需要形成一套完整的话语建构模式。

(二)“阶级革命”话语的系统建构和大众化策略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为指导，结合近代中国的独特国情与革命道路，在系统建构革命话语的同时，运用多种方式行之有效地予以传播和教育。

首先，先进的革命理论是革命话语的思想根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系统构建革命话语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为指导，以列宁与斯大林的革命理论作为思想源流，同时有效借鉴俄国革命的话语范式。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化的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融入马克思主义在经济范畴上的阶级剥削思想，夯实革命之正当性的理论依据。李大钊早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就阐释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强调：“‘社会主义’去打破资本主义，这都是‘革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③另一方面，吸收了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政治范畴的阶级斗争理论，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阐述了对立阶级之间蕴含着剥削、奴役关系，强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其次，革命话语建构基于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借鉴。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斗争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原则。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上，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科学地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深刻阐明由于中国缺乏合法斗争的自由和社会条件，以及革命对象的异常强大与残暴，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武装斗争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式农民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逐步将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组织工农武装割据，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抗日战争。这十余年的革命实践恰是中国共产党将“阶级革命”话语面向劳动群体搭建联系的历史性机遇，革命政策的实践成效扩大了话语影响力和辐射范围。武装割据与土地革命深刻影响了党的革命话语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传播，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将阶级斗争与土地、工资、好日子等民众切身利益相关联，在劳动者中揭露阶级之间存在着压迫与剥削关系，以唤醒和提高其革命觉悟。

其三，党的革命话语通过多种媒介广为宣传和教育，以实现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大众化。毛泽东倡导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进行更为通俗易懂的话语加工，形成为普通劳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革命话语。通过党报党刊、党内生活、各类学校、社会团体等途径强化革命话语的学习、教育和宣传，取得了显著成效。被压迫阶级与劳动群众通过知晓和认同“阶级革命”话语，掌握阶级斗争方法，投入到实现他们利益诉求的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洪流中。《速写陕北九十九》中对一位红军战士描述道：“看他的样子，好像叫化子一样，但他一谈起话来，世界的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中国的抗日阵线与亲日阵线，他清楚的很。”^④革命话语的影响范围的深度、广度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①《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页。

②《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16—217页。

③李大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922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5—56页。

④《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编纂《速写陕北九十九》(影印本)，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

(三)“革命与反革命”是理解把握“阶级革命”话语的核心范畴

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与优点。显而易见,在中国共产党整体建构的“阶级革命”话语体系中,革命主体与革命对象、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问题,是我们解读和把握这一革命话语体系的关键概念或核心范畴。

首先,革命话语核心概念在于“革命”与“反革命”这一对关系范畴,呈现界限分明的二元对立的话语张力。“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对立关系确证了对落后阶级的斗争性、对旧制度的破坏性。马克思指出:“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①在反革命力量异常强大和残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作为这一时期最具时代性标识的政治话语,二元对立有利于明确自身政治立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政策。毛泽东认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②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阶级革命”话语的重要特质,也是理解把握暴力革命实践的关键。

其次,“革命与反革命”标示的阶级对立关系,更具有引导劳苦大众基于切身利益投身革命实践的动员功效。相较于“国民革命”话语以全民一致性掩盖阶级差异性,普通民众的被剥夺感和被奴役感也未被普遍唤醒,他们投身革命,但利益获得感和成就感不强,而阶级斗争则实实在在帮助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农民群众将获得土地,工人群众会提高工资。阶级斗争使得革命不再是大官僚、知识分子等少数精英群体参与的政治博弈,“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对立关系有助于中国共产党赢得广泛的群众基础与革命认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战争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夺取国家政权的重要条件。

其三,二元对立的革命话语体系强化了暴力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直陈妥协退让等右倾错误的虚妄性。党的四大提出:“为着要掩饰自己的贪欲,帝国主义者更说他们自己爱和平,主张和平主义……当帝国主义者说这些谎话的时候……”^③正如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掷地有声地讲到,“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④。可以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运用“阶级革命”话语领导劳苦大众进行武装斗争的历史。虽然革命战争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内容,战争主体有广狭之分,战争对象有内外之别,然而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二 不断革命: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延伸与拓展

从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理论,形成以“不断革命”为理论内核的革命话语体系。在革命话语主导下,中国共产党以社会改造、经济建设、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等方式推动新中国各项事业的改造、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为中国人民“富起来”奠定了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坚实基础。同时,由于当时国内外环境的制约和复杂影响,“不断革命”话语实践一度导致社会主义建设偏离了的正确方向,在探索中出现了两个发展趋向。

(一)“不断革命”话语对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不断革命”话语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不断革命”理论。马克思提出:“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⑤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理论强调无产阶级要有彻底革命精神,坚决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及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

①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401页。

②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页。

③《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192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72页。

④毛泽东《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⑤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57页。

专政,直到把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都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一理论指导毛泽东卓有成效地探索出中国革命的规律,即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两步之间不允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中间阶段,第一步走完,就要不停歇地接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既已取得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在夺取国家政权后就要坚持不停顿的“不断革命”。

其次,思想变革与生产力变革相结合的“不断革命”及其转向。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推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进程中,遵循马克思“不断革命”理论的实践要求,把传统革命话语与执政党新的使命和工作重心有机结合,选择以社会改造、经济建设、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等方式继续进行革命。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强调:“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①在这里,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完成,但是技术上的革命尚需进一步实现,“不断革命”话语由此具备了思想变革与生产力变革的内涵,这一变化预示着一种可贵的探索努力和创新方向。然而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对这种形势的误判,革命话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转换呈现出另一种发展趋向,“不断革命”话语逐步放弃了向技术革命与思想变革方向演化,重新被阐释为敌我矛盾与阶级斗争。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虽然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但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党的九大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违背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基本任务的学说和我国的实际国情。

其三,“不断革命”话语的作用发挥及其影响。“不断革命”话语在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历史性作用。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强调,在那一时期“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③。另一方面,革命话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运用一度走向思想变革与生产力变革相结合的良好趋向,但很遗憾这一趋势在实践中未能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影响了毛泽东对我国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历史方位的客观认知,当以“革命”的方法发展生产力的努力陷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误区时,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就不可能是科学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

(二)“继续革命”话语是在执政建设时期形成的特殊革命样态

“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二者在语义上的相通或相近是不言而喻的,具体分析二者的区别则要结合社会历史条件,即要纳入具体语境下予以理解。“继续革命”话语可以说是“不断革命”话语在执政建设的特殊时期形成的一种特殊样态。对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明辨并阐释其所具有的正向积极作用与负面消极影响,并在探究历史成因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

首先,“继续革命”话语在执政实践与意识形态统摄方面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当革命对象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向着落后生产力、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等领域转化时,这一转化符合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党的工作重心的相应转移。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成功的革命党成为全国性执政党,“不断革命”话语无疑将继续指导执政党治国理政新的实践,并深入到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不断”的或“继续”的革命话语居于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摄地位,以“革命”为前缀的语汇成为主流话语体系,并通过报刊、杂志、广播、影视、戏剧、歌舞、教材等载体广为流布,渐成社会日常话语,革命价值观深入人心。“继续革命”话语样态在政治话语、大众话语、学术话语方面呈现高度一致性,促进社会各领域、各群体与党的政治路线保持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

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351页。

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页。

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4页。

理解这一话语的积极意义,我们可从毛泽东提出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①,再到邓小平提出“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命题中,体会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所要完成的使命之崇高和任务之艰巨。正如习近平所讲的,“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②。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革命没有休止符和革命话语的持续性,无疑增强了这一革命话语的权威性与说服力,提升了革命话语的可信度与时代感。

其次,“继续革命”话语所引致的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误区。当“继续革命”话语发展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时,就在和平建设年代导向敌我矛盾与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这样就在理论上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形成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观点。在实践上,毛泽东错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其三,“继续革命”话语出现严重失误的原因分析与经验总结。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③。历史证明,“继续革命”话语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过理论和实践上的严重失误,其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对我国当时的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出现失误,脱离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中国实际,混淆了两类性质的社会矛盾。“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④历史也同样证明,我们党具有坚持真理标准、纠正探索失误以实现自我完善的优良品质,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实现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和丰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伟大社会革命上来,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三)“革命与建设”是辩证理解“不断革命”话语的重要镜鉴

首先,“革命与建设”这对关系范畴深化了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规律性认识。党的八大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已经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于主要地位。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⑤这一时期,革命话语开始向生产力革命方向转变,并探索出一系列极具价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但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⑥,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革命话语的焦点重归“政权问题”与“阶级斗争”,强调新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把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从这个角度考察“革命与建设”的关系问题,能有效检验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科学性与正确性。

其次,“革命与建设”关系范畴促进了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⑦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旧体制、旧话语的摧毁,在新的执政环境下,新中国建立的新秩序需要发挥革命话语的建设性一面,要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既要重视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也要遵循生产

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38页。

②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第2版。

③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第2版。

④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第2版。

⑤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4页。

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1957年10月9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6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页。

⑦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1页。

力与经济基础建设的社会发展规律。在这一过程中理解“革命建设”，“革命”成为攻坚克难之“改革”的代名词，“建设”被赋义为内涵更为丰富的“发展”，“抓革命促生产”与“以改革促发展”的逻辑理路一脉相承，正面理解作为手段的抓革命，就是消除一切影响生产发展的因素，服务于促进社会生产的目的。同理，发展是解决经济社会一切问题的关键，改革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其三，正确把握“革命与建设”的关系有助于实现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的时代性飞跃。建国后，毛泽东曾正确地指明了革命的发展方向即为建设，提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①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提及的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即阶级斗争语境下的阶级革命。当革命取得成功之后，要把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建成发达的工业国，“不断革命”话语应运而生，其时代性内涵遂转变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目标指向是现代化的工业国，也预示着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历史前进方向的先进力量代表，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才能确保其先进性。

三 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重释与升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重新阐释革命话语，通过继承与拓新传统革命话语，规范革命话语建设性功能，逐渐形成“社会革命”话语体系。这套“社会革命”话语体系相较于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和推进的百年社会革命，在内涵上较为狭义，强调执政党通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推动经济社会变革，通过全面改革推动构建社会模式、理顺社会秩序、完善社会制度，并将革命话语进行有效的意识形态加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生产力革命与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社会革命一脉相承，皆是“社会革命”话语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话语具现。

（一）“社会革命”话语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性话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②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和平安定的执政环境，革命话语的建设性功能被充分发挥，开启改革开放伟大革命，促进新时期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首先，重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执政环境。“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废待兴。揭批林彪、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取得胜利，党内民主重新得以伸张，解放了思想，恢复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促使了国民经济发展，营造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当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如何“赶上时代”是“社会革命”话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其次，改革开放成为伟大的革命性转折。社会革命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和方法。恩格斯认为，“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③。邓小平上下求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答案，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⑤。邓小平强调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手段，一方面是继承发展了唯物史观，一方面是赓续拓新了毛泽东关于“四个现代化”、“发展技术革命”等理论和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大力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制度建设等都是围绕发展生产力这一核心命题，“社会革命”话语向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方向靠近，与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相结合。

其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社会革命。习近平指出：“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独创性

①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195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9页。

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通过），《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第1版。

③弗·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6页。

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⑤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①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奋斗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党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逐步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习近平对新时代的社会革命做出新的论断:“我们以敢闯敢干的勇气和自我革新的担当,闯出了一条新路、好路,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社会革命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调整改善国家治理关系,建立健全国家治理制度,发展践行科学的国家治理理念。

(二)“社会革命”话语呈现现代化国家治理样态

首先,重释并升华革命话语的建设性内涵。鉴于“不断革命”话语的理解和运用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失效,其所衍生的“继续革命”话语在实践运用中一度对制度与秩序形成破坏性,因此在改革开放伊始亟需重新予以阐释。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③阶级革命的直接目的在于推倒旧制度,建立新秩序,革命话语中的斗争性内涵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让位于建设性内涵。传统革命话语在价值精神上同样具有生命力或时代性。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话语的重新阐释,一方面将革命话语斗争性有效融入新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将革命话语建设性融入治国理政与制度完善的实践层面,并注重对革命话语的行动方式与手段运用进行规范,充分发挥革命话语的建设性作用,将革命话语从手段形式层面,向革命价值、革命观念、革命精神等意识形态层面升华,意识形态领域重释的革命话语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有机结合,形成了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其次,革命斗争与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详细阐释:“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④党的十九大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的根本任务做出准确定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⑤必要的正当的革命斗争与发展生产力通过正确的革命目标与革命对象形成合力,同向同行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成为新的革命目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成为新的革命对象。顺着这条理路,习近平在新时代提出“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命题,并发展为包括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四个伟大”新话语。

其三,话语传播的方式和载体在信息时代日趋多样化。信息时代新媒体环境中革命话语的传播形式由“一对多”转型为“多对多”。去中心化的“多对多”形式扩大着革命话语传播的范围,使传播的群体范围从党内走向党外,从党政机关走向社会各界。新媒体环境下革命话语的传播过程表现出交流的平等性,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有效引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伟大事业而奋斗,增强了革命话语在当代的生机与活力,提升了革命话语的亲合力与可信度。

(三)“革命与改革”是持续推动“社会革命”话语的内在动力

“革命与改革”,既是革故与鼎新的关系,也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改革是革命之后的再次革命,它以革命

①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第2版。

②习近平《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2018年2月14日),《人民日报》2018年2月15日,第2版。

③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页。

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44—845页。

⑤《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精神作为内在价值,以体制机制改革策略作为外在手段,持续推动社会生产力革命。改革开放亦是一场伟大社会革命,在形式上继承并突破了传统革命话语,与中国话语有机结合,内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展现“社会革命”话语的时代性涵义。

首先,从历史层面看革命的内在价值,既往的革命是一面不朽的丰碑,为推动社会革命提供理想信念与精神动力。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丰碑上铭刻着初心与使命、成就与光荣、曲折与经验,不同历史时期相应的革命话语样态是对初心与使命的坚贞信仰与不懈践行。革命年代以热血与牺牲铸就了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无私与奉献凝聚了大庆精神、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等,改革开放以来,以改革与创新培育了创业精神、抗震救灾精神以及新时代的抗疫精神等。尤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面对“难啃的硬骨头”、“娄山关”、“腊子口”等体制机制上沉积多年的顽瘴痼疾,需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凤凰涅槃的决心,抱定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革命精神,把改革进行到底。

其次,从国家总体安全层面看革命的斗争性及其功能。阶级斗争是一柄利器,必要时可为社会革命斩断一切不安定因素。《中国共产党章程》对阶级斗争作出时代性论断:“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①也就是说,阶级斗争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新时代的革命话语继承与发扬亮剑精神与革命价值,合理运用斗争的方式与手段。在处理敌我矛盾中,仍能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力量;在维护国家政权、国家领土完整、防范民族分裂等问题上,党和国家的政策措施与政治态度都具有革命话语的彻底性与坚决性。

其三,从国家治理层面看,革命话语是保障经济社会各领域和谐有序发展的守望者和调节器,维护社会革命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有序运行。革命话语能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经济领域,调节市场的内生性矛盾,抵御国际市场带来的不正当竞争;在社会领域,立足人民立场,依靠集中力量组织动员群众办大事、办好事、办实事,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在思想文化领域,面对泥沙俱下的社会思潮能够有效守土有责、激浊扬清,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

四 “两个革命”: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升华与拓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站到了更高层次的历史方位上。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主要表现为主要矛盾的变化或矛盾主要方面的变化,相应地,“芳林新叶催陈叶”,社会革命也由浅入深,灌注了更具时代性的丰富内涵。新时代我国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将“四个全面”作为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布局。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革命的目的在于赶上时代,那么新时代自我革命的目的就在于引领时代。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将社会革命进行到底,另一方面高度强调“自我革命”话语,从而构建了“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并重的双核话语体系。2018年初,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②。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对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大意义,阐述了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对我们党领导人民将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到底的重大意义,是新时代革命话语的升华与拓新。

(一)“自我革命”话语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行为逻辑

首先,社会革命的发展为党的执政带来新境遇、新考验和新危险。随着改革进入“深水期”与攻坚期,以及对外开放的深化,我们党执政面临的“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日益突显。为此,习近平提出全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③。“四大考验”是

①《中国共产党章程》,第4页。

②习近平《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18年1月5日),《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第1版。

③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

对党的政治本领和长期执政能力的挑战,这要求党在长期执政中不断提高忧患意识,增强新时代党处理市场经济问题、解决改革开放难题、应对外部环境压力的能力。“四种危险”是对党的执政状态的警醒,这要求我们党强化信仰与能力的关系、党与人民的关系、党与权力的关系。

其次,自我革命是党的优良传统。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虽然没有提出自我革命思想,但唯物辩证法奠定了自我革命的哲学基础。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执政党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批判与清除党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习近平指出:“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冒险主义的坚决斗争,延安时期开展的整风运动,建国以来开展的“三反”运动等,都是党开展自我革命的成功历史实践,形成了党勇于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

其三,自我革命是实现“四个自我”革命目标的磨刀石。在从严治党层面上,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习近平强调:“必须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②中国共产党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革命决心与革命勇气,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与旺盛的革命斗志,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坚决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保持党肌体的先进性与纯洁性,营造正常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与党内政治生态,塑造风清气正、团结统一、充满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二)“自我革命”话语对新时代治党管党模式的整体性诠释

首先,“自我革命”话语形成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自我超越的主客体关系。理解革命确切意涵须结合现实的政治语境,在“自我革命”话语中,党的各级组织、党员干部与普通党员既是革命的主体,也是革命的对象。这符合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自我革命揭示了党的建设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全党上下秉持实事求是原则、利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抛弃自身落后、陈旧的事物,保留先进、纯洁的成分,通过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实现自身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自我超越。

其次,“自我革命”话语在全党各领域全方位发挥作用。在解决理想信念问题层面,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探索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在党员干部与普通党员层面,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党员干部与普通党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组织建设层面,要管理好庞大的党组织队伍,必须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清除党员队伍中的不合格分子和不合格党组织,以严肃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制度建设层面,制度的设计与执行不完善会导致权力不受制约与监督,公权滥用带来利益诱惑会滋生权力腐败,腐蚀党组织的肌体,腐化党员干部的心志,因此,要扎紧权力的笼子,构建起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的权力结构,保证权力运行程序化、公开化、透明化。

其三,“自我革命”话语衍生“防治结合”的诸多实践主题。一方面,“自我革命”须辅之以相关的主题教育活动。全党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四史”学习教育等活动。这些主题教育活动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自我革命的具体展开和生动实践,促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对实现“四个伟大”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产生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作用。另一方面,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严厉整治“四风”问题,采取“打虎”、“拍蝇”、“猎狐”无禁区的雷霆手段,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依规从严治党是其重要抓手。全面深化改革在党的自我革命中的体现,就是要实现作为全面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的全新变革和功能的整体跃升。

(三)“两个革命”是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核心密码

^①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月8日),《人民日报》2020年1月9日,第2版。

^②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月8日),《人民日报》2020年1月9日,第2版。

首先,深刻理解历史周期率的本质。历史周期率是历史上统治阶级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导致政权覆灭而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纵观中外历史,无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统治阶级往往具有以下特征: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脱离群众、权力腐败。历史周期率本质上是由于社会向前发展,生产力想突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而统治阶级即使代表先进生产力夺取国家政权,也会因为脱离群众、权力腐败等问题无法巩固政权。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以来,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保持先进性与纯洁性,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就能蓬勃发展,最终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其次,正确把握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辩证关系。解决政党自身问题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根本途径需要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同向同行、同频共振。习近平提出:“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①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形成互相促进与互为强化的相辅相成关系,一方面,以执政党的现代化引领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构建起现代化的党政关系、党军关系、党和经济的关系、党和社会的关系等;另一方面,以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促进中国共产党做出与时俱进的调整与适应,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使党成为引领时代、人民拥护、经得起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其三,彰显“两个革命”并重的实践原则。一方面,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协同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实践起点。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新时代党内问题与党外问题相互交织,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彼此影响,中国共产党坚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形成领导核心,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才能协调各方力量,凝聚政治合力,协同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另一方面,坚持人民立场是协同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价值旨归和实践终点。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站不稳人民立场,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都会失去价值归依。人民群众是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成果获益者,同时,人民群众也是推进新时代伟大革命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只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奋发有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协调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一定能够在新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有力地推向前进。

五 结语

纵览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构建与倡导革命话语是个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光荣的革命奋斗史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领导地位的历史依据,也是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等阶段的历史实践都呈现出革命话语的辩证色彩。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的历史演进,革命话语的语义也依据革命语境发生嬗变,并随历史方位和时代环境的转换而形成不同的话语样态,用以指导和推进中国不同类别的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革命话语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与实践,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精神。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进一步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继承拓新中国特色的革命话语体系,将革命话语与中国话语有机结合,将革命话语的价值与信念融入中国话语,将革命精神与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度融通,汇聚成为支撑新时代新征程改革开放继续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责任编辑:何毅]

^①习近平《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2019年1月11日),《人民日报》2019年1月12日,第1版。